



北方草原地区 鲜卑金银器 造型艺术研究

张景明

摘 要: 鲜卑金银器在继承匈奴风格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融合了中原地区、西方国家的因素,形成有自己特色的金银器造型艺术,使其达到一个深化阶段。在造型艺术中,草原上常见的动物成为主要的装饰题材,寓意鲜卑的经济类型、民族性格、原始信仰、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涵。

关键词: 鲜卑; 草原地区; 金银器; 造型艺术; 文化内涵

文章编号: 1003-2568(2008)01-0096-11

中图分类号: K876.43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张景明, 大连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民族学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邮编: 116622

鲜卑在东汉时见于史籍, 魏晋时期分为拓跋、段部、慕容、宇文、秃发、乞伏等部, 其中, 以拓跋鲜卑和慕容鲜卑为主。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北端南迁, 到达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 先后建立了代和北魏政权, 进而入主中原地区, 迁都洛阳。在南迁过程中, 社会组织由原始部落制转化为奴隶制, 又到封建制的转变, 其文化内涵发生重大变化。慕容鲜卑主要活动于辽西地区, 先后建前燕、后燕、西燕、南燕等政权, 多受汉族文化的影响。

鲜卑的族源, 在史书中颇有记述。《后汉书》卷九十《鲜卑传》记载:“鲜卑者, 亦东胡之支也, 别依鲜卑山, 故因号焉。”又曰:“汉初, 亦为冒顿所破, 远窜辽东塞外, 与乌桓相接, 未常通中国焉。”鲜卑原本东胡的一支, 居住在鲜卑山(今大兴安岭南段、内蒙古科左中旗西), 因而以山名为族名。但史书中还提到大鲜卑山, 根据《魏书·序纪》的记载和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石刻祝文的发现, 考证大鲜卑山就是嘎仙洞所在的山名, 即拓跋鲜卑的起源地。在鲜卑的遗物中, 金银器最能体现其草原风格的特征, 造型艺术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特色, 并具有文化的内涵和寓意。

一、鲜卑金银器的造型艺术

鲜卑金银器的造型艺术, 从风格上分为东汉、两晋十六国和北魏三个阶段。东汉鲜卑的金银器, 从用途上分为装饰品、生活工具饰件、生活器皿、日杂器四大类, 装饰品的数量最多, 可细分冠帽饰、头饰、耳饰、手饰、腕饰、缀饰、扣饰、带饰等。生活工具饰件装饰在刀柄上, 生活器皿和日杂器的数量少, 不见马饰具。两晋十六国时期, 鲜卑的金银器分装饰品、印章和日杂器, 以装饰品为主, 又细分冠饰、发饰、耳饰、挂饰、佩饰、缀饰、带饰。北魏鲜卑的金银器分装饰品和生活器皿, 以装饰品居多, 又细分冠饰、耳饰、项饰、腕饰、指饰、缀饰等, 生活器皿为容器。

东汉时期, 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北端南迁, 沿途所经过的路线基本上是草原地区, 金银器的造型多为草原上常见的动物, 类别有马、羊、骆驼、鹿、野猪, 还有神兽、怪兽、人物、人面、联珠、纠结、螺旋等。在布局上, 受匈奴和汉民族文化的影响。

马是这一时期金银器造型的典形代表,

分直立状和卧状,有单马和双马,饰牌没有边框限制。写实性的马,各部位展示清晰。如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六家子墓出土的马形金挂饰,马作卧姿,马首下俯,双耳前立,马鬃竖起,尾下垂,四肢内屈,形象生动(图一)。双马形金佩饰,马俯首,臀部相连,相向而行(图二)。轮廓式马,呈直立状或卧状,有单马和双



图1 马形金挂饰,东汉,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六家子墓葬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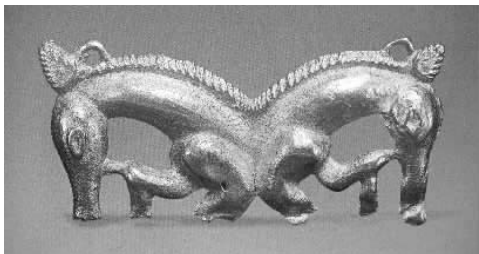


图2 双马形金佩饰,东汉,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六家子墓葬出土

马。如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三道湾墓出土的双马纹金缀饰,马呈轮廓状,正面弧形凸出,用半浮雕的技法,为跪卧状,腿与尾连成底边和侧边,头部饰一圆形冠状,马背上站立一小马,组成一个双马的整体造型,两马都无细部展现,仅在头、颈部饰压印纹以示马鬃,给人一种模拟的感觉(图三)。

羊的造型采用透雕的手法,限于边框之内。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添密梁墓出土的双

羊纹金饰牌,边框内透雕两只相对的羊纹,中间竖向相衔三轮,羊呈直立状,昂首作衔轮状,腿部内屈弯成轮形,羊角上方镂空,具有写实与图案相结合的艺术效果(图四)。



图3 双马纹金饰牌,东汉,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三道湾墓葬出土



图4 双羊纹金饰牌,东汉,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添密梁墓葬出土

驼的造型数量较少,呈图案化。如察哈尔右翼后旗三道湾墓出土的驼形金缀饰,驼呈昂首伫立状,采用透雕手法,神态抽象。

鹿分单体和组合两种造型,用透雕的手法表示写实与图案相结合的造型艺术。单体造型,图案化较强,只表现鹿的轮廓,没有细部展示。如察哈尔右翼后旗三道湾墓出土的鹿形金缀饰,鹿呈卧姿,鹿角变形向后曳至臀部,美化了鹿的形象(图五)。多体组合造型分双鹿和三鹿,限于边框内,双鹿呈对鸣状,角

张柏忠:《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考古》1989年5期,第430-438页。

乌兰察布博物馆:《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407-433页。

原平:《鲜卑金饰牌及范纹陶罐》,《呼和浩特文物》第1期,1987年,第36-3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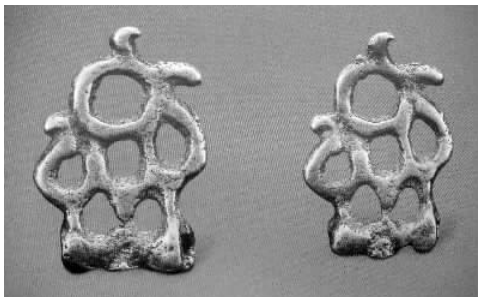


图5 鹿形金缀饰, 东汉, 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三道湾墓葬出土

用镂空的手法表现, 以写实为主, 图案化点缀。如察哈尔右翼后旗三道湾墓出土的三鹿纹金饰牌。三鹿呈首尾相衔的伫立状, 首昂反颈, 角、腿镂空, 不表示首部细节, 具有写实与图案相结合的艺术效果。

人面造型采用透雕工艺表示首部的五官特征, 加以镂空的手法, 具有图案化艺术形象。如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腰力毛都苏木北哈拉图达嘎查出土的人面纹金佩饰(图六)。



图6 人面形金佩饰, 东汉, 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腰力毛都苏木北哈拉图达嘎查墓葬出土

人与兽的组合, 镂空, 呈半浮雕式, 立体效果较强。如科尔沁左翼中旗腰力毛都苏木北哈拉图达嘎查出土的胡人搏兽纹金佩饰, 胡人居中, 两侧为腾跃的猛兽, 组成一幅反映当时人们生活场景的图案(图七)。

野猪造型分奔跑状和行走状, 写实性强, 具有立体艺术。如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另皮窑墓葬出土的嵌宝石野猪纹包金铁带扣、嵌宝石野猪纹包金铁带具, 先在模中浇铸出包金部分, 待冷却凝固后再浇铸铁芯, 在铁芯背后



图7 胡人搏兽纹金佩饰, 东汉, 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腰力毛都苏木北哈拉图达嘎查墓葬出土

铸出钮, 然后再锤揲镌刻纹饰。野猪纹凸纹很高, 呈高浮雕式, 野猪身体各部位都表示出来, 形成半立雕式立体与平面相结合的方法。这样, 从单模浇铸、锤鏊到浮雕式, 最后演变成半立雕与平面相结合, 可看出工艺的演变过程。带扣、带具表面镶满宝石, 与纹饰同时起着主体装饰作用(图八)。另一件圆形野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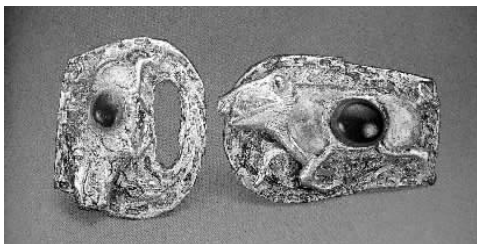


图8 嵌宝石野猪纹包金铁带扣, 东汉,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另皮窑墓葬出土

纹金饰牌, 在表面锤出行走的野猪, 俯首弓背, 有半浮雕的效果, 身部作不规则的短弧线表示猪毛, 鬃毛由额至后背呈扇形排列, 尾卷至臀部偏上, 使整个野猪形态呈安详自得之态。

神兽造型为鸟喙、豹身、羊角、双翼, 形状与辟邪相似。如内蒙古土默特左旗讨合气墓出土的神兽纹包金铁带扣, 包金铁芯, 是经过分别模制, 再套合包在一起, 然后在表面锤揲雕刻细部纹饰, 神兽纹凸度大, 呈浮雕式(图九)。

纠结造型装饰于带饰上, 用动物形象屈曲成形, 头长角, 似龙, 并两两纠结在一起。如和林格尔县另皮窑墓葬出土的纠结纹金饰牌。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和林格尔另皮窑村北魏墓出土的金器》,《内蒙古文物考古》第3期,1984年,第52-54页。

伊克坚、陆思贤:《土默特左旗出土北魏时期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第3期,1984年,第5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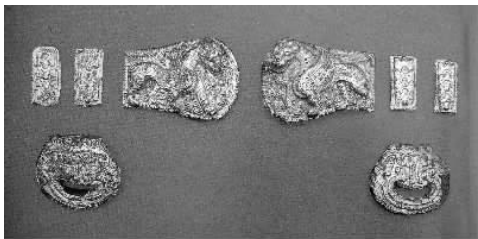


图9 神兽纹包金铁带扣,东汉,内蒙古土默特左旗讨合气墓葬出土

火焰造型也饰于带饰上,呈竖向排列,形状似倒飞的燕子,半浮雕式。如土默特左旗讨合气墓葬出土的火焰纹包金铁带饰。

联珠采用焊接技术工艺,增加艺术效果,珠子大小均匀,焊接牢固,若剥落后,金片表面无多大伤痕。如和林格尔县另皮窑墓葬出土的联珠纹管状饰。

螺旋纹也称之同心涡纹,一般见于帽饰和耳饰上,组成数量不等、大小不一的螺旋纹。如察哈尔右翼后旗三道湾墓葬出土的螺旋纹金耳坠。

凤鸟造型用立体圆雕的形式表示,缀以金叶,形成最初的金步摇冠饰,慕容鲜卑盛行。如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毛力吐墓葬出土的凤鸟形金步摇冠饰(图一)。



图10 凤鸟形金步摇冠饰,东汉,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毛力吐墓葬出土

从工艺上讲,东汉鲜卑的金银器,以单模浇铸居多,模压、切割、抛光、锻打、锤鍍、錾刻、镶嵌、焊珠、掐丝等工艺应用十分娴熟,透

雕、浮雕、立雕的技法广泛使用,使图案具有很强的立体效果。

两晋时期,拓跋鲜卑的主体活动于内蒙古的大青山以南地区,所遗留的金银器数量较少,仍以动物为主,分单体动物、群体动物和动物咬斗三种,动物类别有虎、熊、兽,多为凶猛的肉食动物。单体动物采用铸造、圆雕、镶嵌工艺,表现兽的全身和兽面。如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窖藏出土的嵌宝石跪兽形金饰,跪兽似熊,前肢捧腹,似在觅食,形象极为生动,具有很强的立体效果(图一一)。嵌松石



图11 嵌宝石兽形金饰件,西晋,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窖藏出土

兽面金戒指,只表现兽的首部,简单明了(图一二)。群体动物以同种动物两两相对或相背



图12 嵌宝石兽面形金戒指,西晋,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窖藏出土

排列,构成整体图案。如凉城县小坝子滩窖藏出土的“猗窠金”四兽形金佩饰,四兽呈两两相背,上下排列,四肢前伸作扑食状,用椭圆形凹叶表示耳、眼及身躯的兽毛,起美化图案的作用(图一三)。动物咬斗表现凶猛动物对

赵雅新:《科左后旗毛力吐发现鲜卑金凤鸟冠饰》,《文物》1999年7期,第39-40页。

张景明:《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金银器窖藏》,《文物》2002年8期,第50-52页。



图 13 “猗窕金”四兽形金佩饰，西晋，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窖藏出土

温驯动物的撕咬场面。如凉城县小坝子滩窖藏出土的虎咬鹿形金挂饰，虎昂首衔鹿，鹿作挣扎状，在虎身上装饰狼首、菱纹，并用透雕工艺表现鹿、虎背、虎尾，具有写实和抽象相结合的艺术（图一四）。从凉城县小坝子滩窖



图 14 虎噬鹿纹金挂饰，西晋，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窖藏出土

藏出土的这批金银器看，动物造型的写实性艺术较强，有的动物造型融写实与抽象为一体，起到了美化图案的作用。在工艺上，多采用模铸，结合平面浮雕、透雕、圆雕的手法，还有圆雕与镶嵌结合的手法，增加了动物造型的立体效果和直观艺术。

慕容鲜卑金银器的造型种类有花树、云朵、龙凤、鹿、羊、佛像、粟粒等。花树状的造型一般用于步摇冠饰，由山题、牌座、枝干、叶片组成，装饰华丽，造型独特。云朵起点饰的作

用。龙凤采用透雕工艺，使之图案化，成双出现。如辽宁朝阳市田草沟墓葬出土的双龙双凤纹金缀饰（图一五）。鹿呈群状排列，鹿首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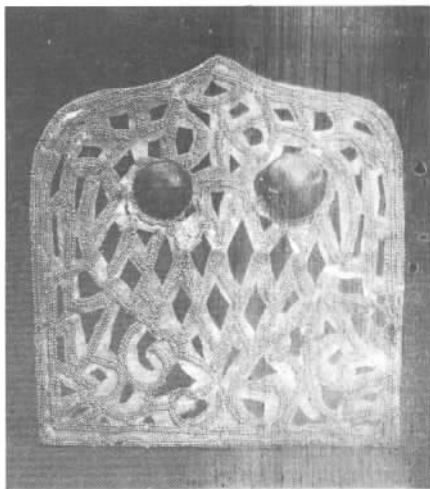


图 15 双龙双凤纹金缀饰，晋，辽宁朝阳田草沟墓葬出土

颈，角、腿呈图案化，没有表现鹿的细部。如辽宁朝阳市王子坟山墓葬出土的三鹿纹金饰牌和辽宁义县保安寺墓葬出土的三鹿纹金饰牌（图一六）。羊成双相对，运用写实与图案



图 16 三鹿纹金饰牌，西晋，辽宁省义县保安寺墓葬出土

相结合的艺术造型，表现羊的主体。如辽宁北票市喇嘛洞墓葬出土的双羊纹金饰牌。佛像见于冠饰，呈坐姿，有背光，采用模压工艺。粟粒起点饰作用，呈竖向、横向或环状排列。从总体上看，具有草原特征的动物造型不再占

朝阳市博物馆等：《辽宁朝阳田草沟晋墓》，《文物》1997年11期，第33-41页。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阳王子坟山墓群1987、1990年度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97年11期，第4-18页。

刘谦：《辽宁义县保安寺发现的古代墓葬》，《考古》1963年1期，第23-25页。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第209-242页。

主要地位,多见图案化的动物,缺少写实性的单体动物,其他造型种类(如植物等)的比例上升。在器物上缀饰叶片比较流行。在工艺上多采用锤鍍、鑿、铆,还有透雕、模压、镶嵌、粘接、套扣、丝环联缀等技法。

从已知的资料看,北魏时期的金银器族属仍分拓跋鲜卑和慕容鲜卑。拓跋鲜卑的金银器造型,以素面较多,动物只见羊,分立式和卧式,采用锤鍍工艺做成主体造型。如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美岱村墓葬出土的嵌宝石立羊形金戒指和嵌宝石卧羊形金戒指,戒面为盘角羊的造型,戒圈两侧作兽面形,羊、兽上采用焊珠和镶嵌的技法,使整体形象显得华丽(图一七)。金珠细工工艺,在东汉时



图 17 嵌宝石立羊形金戒指,北魏,内蒙古土默特右旗美岱村墓葬出土

由波斯传入,到北魏时比较盛行,珠粒较为饱满圆润,与镶嵌工艺巧妙地结合,增加了立体效果。其他的金银器(如耳环、缀饰、钏等),多采用铸、锤鍍、鑿刻的技法,都为前代所常见的工艺。

慕容鲜卑多戴步摇冠饰,从这一点断定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西河子窖藏出土的金器为慕容鲜卑拥有。从十六国时期以后,慕容鲜卑除仍居住在辽西、辽东地区外,有部分散居于草原其它地区,除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多。金龙饰的造型就是汉民族一直流行的造型题材,但龙角较汉族的龙长,具有典型的北朝特征;工艺采用卷制、编缀、镶嵌、焊接等,并饰附件,装饰在项或腰部,显得高贵、华

雍(图一八)。步摇冠,仍为枝干状,山题造型演变为牛、马首,为草原上常见的动物;采用模铸、焊接、金珠细工、镶嵌、鑿、冲等工艺,尤其是金珠细工和镶嵌的统一结合,成为北魏金银器工艺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图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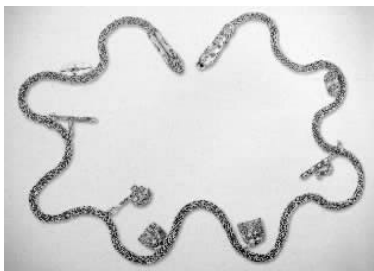


图 18 龙形金饰,北魏,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西河子窖藏出土



图 19 1、牛首金步摇冠饰,北魏,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西河子窖藏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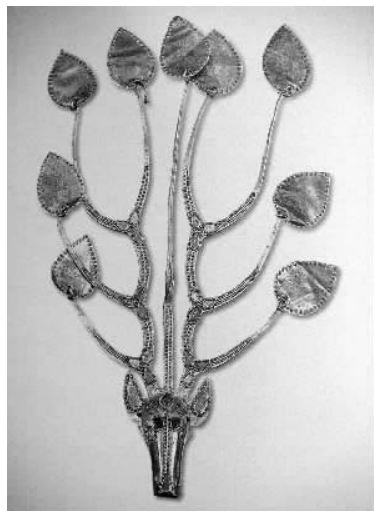


图 19 2、马首金步摇冠饰,北魏,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西河子窖藏出土

李逸友:《内蒙古土默特旗出土的汉代铜器》,《考古》1956年2期,第25-26页。

陆思贤、陈棠栋:《达茂旗出土的古代北方民族金饰件》,《文物》1984年1期,第81-83页。

二、鲜卑金银器造型艺术的文化交流和内涵

东汉拓跋鲜卑的金银器造型以动物为主,与欧亚草原“野兽纹”风格的造型艺术达到一致。在装饰风格和制作工艺方面,继承了匈奴金银器的特征,又融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因素,形成颇具风格的鲜卑金银器。而慕容鲜卑的金器,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多,特点鲜明,与拓跋鲜卑迥然不同。

科尔沁左翼中旗六家子墓葬出土的马形金挂饰,马四肢内屈,俯首,神态与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匈奴墓葬出土的卧马纹金剑鞘饰片的马纹如出一辙。三道湾墓葬出土的双马形金缀饰,其造型也为四肢内屈,马首下俯。透雕工艺在西汉匈奴的金银器中大量使用。如甘肃华池县出土的双兽纹金饰牌和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双驼纹金饰牌,图案限于边框内,动物成双相对,呈伫立状。东汉鲜卑的金银器,透雕工艺更显成熟,风格与匈奴非常接近。如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双鹿纹金饰牌,用线条刻出鹿的轮廓,图案化极强,与鲜卑的双鹿纹金饰牌相比,显得原始粗朴。三鹿纹金饰牌,在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三道湾墓葬、卓资县石家沟墓葬、察哈尔右翼后旗井滩村、林西县苏泗汰墓葬及通辽市都有发现,风格一致,鹿呈首尾相衔伫立状,鹿首反颈,角、腿镂空,具有较强的图案化艺术,此类造型的铜饰牌在其他鲜卑遗迹中为数不少(图二)。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墓、华池县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及收藏的金剑鞘饰片、金饰牌,图案布局讲究对称,这一点被东汉鲜卑的金银器所继承,并且普遍使用。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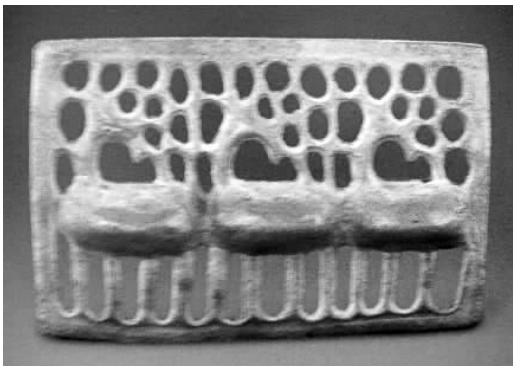


图20 三鹿纹金饰牌,东汉,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井滩村墓葬出土

此,西汉匈奴的金银器造型和工艺,对东汉鲜卑的金银器风格有着直接的影响。

从工艺上讲,许多新出现的技法都是从西方地区传入。土默特左旗讨合气墓出土的嵌宝石神兽纹包金铁带扣,主体纹饰锤成凸纹,细部又采用雕刻法,这种工艺约在公元三世纪初从波斯传入。神兽纹比匈奴的怪兽纹更标准,为鸟喙、豹身、羊角、双翼,表示出对西方文化的一种传承关系,抑或拓跋鲜卑对有功其天神的崇拜。拓跋鲜卑在初出大兴安岭时,被困在大泽中,经“其形似马,其声类牛”的神兽导行,才解脱困境,类似的神兽纹在内蒙古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墓、吉林榆树县老河深墓中均有发现。镶嵌技术也有时代特征,夏鼐先生说:“镶嵌之术,先秦已经产生,但镶宝石、珠饰以晋代为盛,并有镶金刚石者,是为希腊、罗马,东向输入我国和东南亚。”和林格尔县另皮窑墓出土的野猪纹金带扣、带具,表面镶满了宝石和绿松石,使野猪纹与镶嵌同时起着主体装饰的作用,这是有别于北方草原地区传统的镶嵌工艺,无疑与中西方文化交流有一定的关系。联珠纹,使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等:《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7期,第1-10页。

黄晓芬、梁晓青:《甘肃华池县发现透雕金带饰》,《文物》1985年5期,第40页。

谭前学:《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金牌饰》,《文博》1997年4期,第52-53页。

内蒙古博物馆:《卓资县石家沟墓葬出土资料》,《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2期,第32-43页。

林西县文物管理所:《林西县苏泗汰鲜卑墓群》,《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461-462页。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12期,第673-680页。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

夏鼐:《北魏封和突墓出土银盘考》,《文物》1983年8期,第5-7页。

用焊珠技法,珠子饱满圆润,这一技法在波斯地区所流行。金步摇冠、胡人搏兽纹金佩饰,其制法与造型与阿富汗大夏墓(公元前—公元一世纪)出土的金头饰、胡人驯兽纹



图21 胡人驯兽纹金佩饰,公元元年前后,阿富汗大夏国宝藏出土

金佩饰(图二一)相似,说明西方文化对东汉鲜卑的金银器影响甚多。

北魏时期,从西方传入的舶来品也能说明北方草原地区与西方文化交流的状况。如宁夏固原县西郊墓葬出土的银耳杯、波斯银币,大同市南郊墓葬出土的鎏金螭花银碗,大同市北魏城址中出土的银多曲长杯、螭花银碗,大同市北魏封和突墓葬出土的狩猎纹银盘、银耳杯、银高足杯。大同市南郊墓葬出土的鎏金螭花银碗,敞口,口下微内收,弧腹,圈底;口沿、上腹各饰一周联珠纹,腹部以阿堪突斯(Acanthus)叶纹划成四区,每一区有一圆形环饰,内鑿一男子侧身头像,头戴圆形帽,深目高鼻,长发披肩。这种叶纹和圆形环饰是波斯萨珊和中亚艺术中常见的纹样,但圆形帽的人物特征属于中亚样式,在嚧哒货币上常有装饰,故其产地应在中亚,可能与嚧哒人有关(图二二)。北魏城址出土的银多曲长杯,分八曲,平沿,内底心饰二兽。这种风格在中国找不到渊源,其造型与波斯萨珊银器中流行的同类器相近(图二三)。封和突墓出土的狩猎纹银盘,敞口,弧腹,浅



图22 鎏金螭花银碗,北魏,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北魏墓出土



图23 银多曲长杯,北魏,山西省大同市北魏城址出土

盘,圈足;盘内的狩猎图为中间站立一狩猎者,头戴圆形帽,前额有圆珠帽饰,脑后有飘带,颈部悬挂圆珠项链;面部有络腮胡须;上身裸露,系腰带,下身穿紧身裤,足蹬长筒靴;猎者双手持矛,右足踏一野猪,长矛所指方向还有两头野猪(图二四)。这类狩猎题材

盘,圈足;盘内的狩猎图为中间站立一狩猎者,头戴圆形帽,前额有圆珠帽饰,脑后有飘带,颈部悬挂圆珠项链;面部有络腮胡须;上身裸露,系腰带,下身穿紧身裤,足蹬长筒靴;猎者双手持矛,右足踏一野猪,长矛所指方向还有两头野猪(图二四)。这类狩猎题材



图24 狩猎纹银盘,北魏,山西省大同市封和突墓出土

梅村:《大夏黄金宝藏的发现》(上),《文物天地》1991年6期,第28-33页。

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宁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第6期,第46-56页。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第1-13页。

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北魏城址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9期,第11-14页。

大同市博物馆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第1-4页。



的银盘,与波斯萨珊中的狩猎纹银盘的风格同属一类,图中的狩猎者也为在伊朗高原生活的人的形象,归属为波斯萨珊银器应该无误。土默特右旗美岱村墓葬出土的嵌宝石立羊形金戒指和内蒙古博物馆收藏的嵌宝石卧羊形金戒指,在戒指边缘饰联珠纹,又具有中亚金银器的特点。

东汉鲜卑的金银器动物造型,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其经济生活。《后汉书》卷九十《鲜卑传》记载:“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又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野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又有貂、豹、鼬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为名裘。”《魏书》卷一《序记》载:“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说明鲜卑以畜牧业为主,兼营狩猎。金银器的动物造型,有马、羊、驼、鹿、野猪,包括家畜和野生动物,证明了鲜卑的游牧经济生活。

鲜卑经历了原始部落阶段,动物造型又具有图腾文化的深层含义。在东汉鲜卑金银器的造型艺术中,常见草原地区生存的动物,与其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就使鲜卑对动物有着某种亲近感,最终产生了对动物的崇拜,即图腾文化。图腾崇拜是原始宗教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原始时代出现虚幻的、超自然力观念密切相关,也与氏族外婚制和氏族组织密切相关,它负有维系血缘亲族关系和实行外婚制的职能。同一图腾崇拜的人们被认为来自同一祖先的后代,属于同一社会组织。每一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一般选择与他们物质生产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的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鲜卑从大兴安岭南迁之际和南迁过程,处于原始部落阶段,把与其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作为图腾崇拜。东汉鲜卑金银器上的动物造型,多为草原上常见的动物,有马、羊、驼、鹿等,这些动物造型与鲜卑的生产和生活有很大的关系,使鲜卑很自然地把动物作为图腾崇拜,并在器物上加以装饰。

两晋时期,拓跋鲜卑金银器的造型仍为动物,在风格上继承了汉代匈奴和鲜卑的特征,并且受汉族文化影响,在布局上却有创

新。虎咬鹿的造型,是战国至汉代匈奴金银器所盛行的一种构图,反映了草原上弱肉强食的生动画面和以动物为图腾的部落间征战的文化寓意。

透雕、圆雕工艺,是西汉匈奴和东汉拓跋鲜卑金银器普遍使用的技法,使动物造型具有很强的立体效果和直观感。而群体动物两两相对或相背,上下排列,然后又组成整体的兽面图案的作法,是两晋拓跋鲜卑所独创(图二五)。印章的出现,明显是汉民族的特征。自



图 25 四兽形金佩饰,西晋,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窖藏出土

西汉以来,中央政府在匈奴、乌桓、鲜卑地设置机构和官职,统一管理这些民族的事务。“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就是当时西晋政府在鲜卑地设置的官员,金印的发现,充分证实了这一历史事实(图二六)。“猗窋金”四兽形金佩饰上的“猗



图 26 1、“晋鲜卑归义侯”金印,西晋,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窖藏出土



2. 印文

卮”二字,说明这批金银器是当时拓跋鲜卑猗
卮部的遗物(图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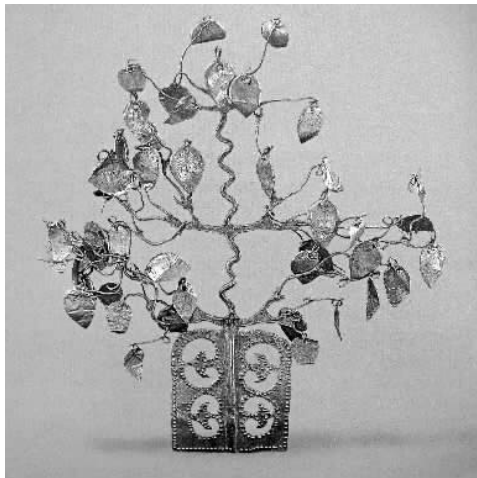


图 27 “猗卮金”四兽形金佩饰的铭文

慕容鲜卑的金银器造型,融汉民族、拓跋
鲜卑、西方文化的因素。金步摇冠饰,在东汉
就已出现,造型不同于两晋十六国时期的花
树状,类似的金步摇饰在阿富汗席巴尔甘大
夏墓中也有发现,在形制与工艺上有着惊人
的相似,繁缛程度不及大夏的黄金步摇冠饰。

朝阳田草沟墓葬出土的缀叶金缀饰、北票市
房身村墓葬出土的双龙双凤纹金缀饰,其上
缀以圆形金叶的作法与大夏墓胡人驯兽金佩
饰上的圆叶相近。步摇冠与缀叶金饰,大约在
东汉传入中国,先在汉地流行,转而成为慕容
鲜卑效仿,成为其金饰品中的一大特色,后又
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朝阳市王子坟山墓葬、
义县保安寺墓葬出土的三鹿纹金饰牌,与察
哈尔右翼后旗井滩村墓葬、三道湾墓葬、林
西县苏泗汰墓葬出土的东汉拓跋鲜卑的三
鹿纹金饰牌,在造型、工艺上保持一致。北
票市喇嘛洞墓葬出土的双羊纹金饰牌,羊的
形象和图案化与写实性相结合的艺术,同于
呼和浩特市添密梁墓葬出土的双羊纹金饰
牌,说明慕容鲜卑的部分金器和拓跋鲜卑的
金器有一定的共性。以龙、凤为题材的造型,
又是受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当时,中原地区
有大批难民流入辽西地区,与慕容鲜卑混居
在一起,在器物上融有汉民族文化的因素不
为罕见。

在朝阳市田草沟墓葬、王子坟山墓葬、
十二台砖厂墓葬、北票市房身村墓葬、西
官营子冯素弗墓葬、喇嘛洞墓葬,都发现
花树状金步摇冠饰,这是从东汉时期开始
流行的一种冠饰(图二八)。《后汉书·舆
服志》记载:皇后祭庙戴步摇冠,“以黄金
为山题,贯白珠为

图 28 花树状金步摇冠饰,晋,辽宁省朝阳市
田草沟墓葬出土

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1期,第16-20页。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11期,第19-32页。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3期,第7-28页。

桂枝相缪，一爵九华，熊、虎、赤黑、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王先谦先生在《后汉书集解》引陈祥道说：“以金为凤，下有邸，前有笄，缀五彩玉以垂下，行则动摇。”可知制作步摇冠的原料为黄金；山题指“山”字形装饰，作为冠饰的前额；贯白珠指镶嵌宝石；一爵九华为鸟、花装饰。东汉的凤鸟形金步摇冠，就是用凤鸟作造型。两晋十六国的金步摇冠饰，不见鸟、兽、花的装饰，只在枝杈上缀金叶，对步摇冠的形制有所改造。慕容鲜卑的步摇冠饰在晋代以后兴盛。《晋书·慕容廆载记》记载：“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这里且不提慕容鲜卑的名称来源，从中可知慕容鲜卑对步摇冠的喜好。

慕容鲜卑最初在今西拉木伦河流域活动，这里水草丰盛，过着迁徙的游牧生活，从事畜牧业和狩猎业。曹魏初年，慕容鲜卑在首领莫护跋的率领下，入居辽西，到涉归统治时，又迁居辽东之北，社会经济仍以畜牧业为主。慕容廆继位后，归附于晋，招贤纳士，势力迅速强大，因中原地区的流民大量迁入，不断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在经营畜牧业的同时，还从事农业生产。这一变化，在慕容鲜卑金银器的造型艺术中充分体现出来，羊、鹿说明畜牧业和狩猎业经济的存在，龙、凤又是汉民族文化的特征，粟粒能证实经营农业的状况。

佛教从东汉初传入中国内地，随之而来的佛教文化造像艺术也在神州大地上广泛的传播。北燕冯素弗墓葬出土的佛像纹金冠饰，为莲瓣形，中间饰带背光的佛像，呈坐式，左右各有一弟子（图二九）。这种题材的金饰品，为北方草原地区发现最早的佛造像之一，时间为公元五世纪的前半叶，说明佛教在当时已经传播到中国的边远地区。

北魏时期，在北方草原地区生活的民族有鲜卑、敕勒、柔然，后两个民族的势力很快在草原地区强大起来，鲜卑的主体主要活动在阴山以南及中原地区，在经营传统的牧业经济的同时，还从事农业生产，后者甚至居于主导地位。金银器上的牛、马、羊造型，就是鲜卑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实物见证。大同市和固原



图 29 佛像纹金冠饰，北燕，辽宁省北票市西官营子冯素弗墓葬出土

西郊出土的金银器，造型艺术没有丝毫的草原风格，却有西方和汉民族文化的因素，并随着南下中原使汉文化的因素更浓，也可看出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痕迹。这与北魏时期，实行“息众课农”、“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经济政策相吻合。

纵观东汉至北朝时期鲜卑的金银器，在鲜卑活动于草原地区之时，其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文化特征非常浓厚。鲜卑最初虽然为游牧民族，但在其南迁阴山以南敕勒川（今内蒙古土默川平原）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沿着草原地区进行的，因而演变为游牧民族，金银器也显示出草原文化的特色。东汉鲜卑的金银器在继承匈奴金银器风格的基础上，同时又受到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形成具有本民族特点的金银器造型艺术和文化内涵。两晋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的金银器显示出其数量上的优势，并与拓跋鲜卑的金银器特征有明显的区别，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因素比较浓厚。北朝时期，随着拓跋鲜卑的南下中原，在汉族文化因素的全面冲击下，中原地区鲜卑的金银器更加显示出当地的风格，但草原地区鲜卑的金银器却仍然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艺术风格。同时，西方的金银器也传到草原地区，或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由此可见，东汉至北朝时期鲜卑的金银器，可以反映出中西文化和南北文化交流的状况。

（论文来源：2007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编号为 07BF35。）